



活着的理由

钱理群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活着的理由

钱理群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活着的理由/钱理群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2010.12重印)

ISBN 978-7-5495-0012-3

I. ①活… II. ①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8201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魏 东

装帧设计:孙豫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80mm 1/16

印张:20.5 字数:230千字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2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目 录

辑一：“活着”的问题

- 活着的理由 3
- 小城故事：动乱年代活着的根基 9
- 这才是合格的、真正的教师 16
- 作为思想者的教师 44
- 活着的危机：乡村文化、教育重建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64
- “活法”问题：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67
- 有这样一位农村教师 104

辑二：教育问题

- 中小学教师之爱：“亦师亦母(父)”之爱 117
- 名校者，有名师也 130
- 我们给孩子提供了什么样的教育环境 135
- 保卫童年 142
- 请关注打工子弟老师的权利和生命成长 148
- 认真总结二十世纪中国中学教育的经验 151

辑三：学术问题

构建“能承担实际历史重负的强韧历史观”	159
有承担的学者,有承担的学术	194
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学术生态	206
如何对待从孔子到鲁迅的传统	224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	238
应该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的游民问题	243
如何回顾那段革命历史?	250
底层言说的价值,自我警戒和边界意识	257
全球化背景下的鲁迅研究呼唤新的想象力	272
全球现代汉语文学:我的文学想象与文学史想象	280
学术坚守与宽容	286
防止学术研究中的极端化思维	298
学术研究的雄心及其他	303
后 记	319

辑一

“活着”的问题

活着的理由

——我看纪录片《和凤鸣》

尽管比和凤鸣小七岁,也没有经历过她那么多的苦难,但我仍然可以说是和凤鸣的同代人。听她讲述她的故事,却总想起这一代人,包括我自己的许多故事。因此,我一边听,一边也在回忆和思考。而她的讲述,引起我最大震撼的,是她反复谈到的一个问题:“活下去,还是不活”——这也是我们那一代中许多人(当然不会是全部)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说起来,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当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位丹麦王子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活下去,还是不活”就成为了人类共同的永恒的精神命题。

鲁迅有一篇小说《孤独者》,就是对这一问题一个中国式的回应。鲁迅在这篇小说里,讨论了现代中国人,特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活着的理由”的问题。他谈了三个层面的“理由”。第一,是“为自己活着”,为自己的理想、尊严而活着。但中国生存环境的恶劣,人常常被剥夺了“为自己活着”的权利。于是,就进入了第二个层面:“为爱我者活着”,自己不想活,就为丈夫、妻子,为儿女而活着。鲁迅的问题是:如果“爱我者”也不需要我活着,这个时候,人是“活下去,

还是不活”？他“活着”的理由是什么？鲁迅的回答是：“为敌人活着”，活着，是为了让那些非要我死的人，感到不舒服。这就是鲁迅式的“反抗绝望”，是惊心动魄的。

现在，和凤鸣，和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当代中国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也遇到了这个“活着的理由”问题：这同样也是惊心动魄的。

和凤鸣和我们，都曾经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着。我们那一代的理想，就是“革命”，建立一个独立、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一个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的新社会。那时候，我们活着是有尊严的。

但1957年，一夜之间，和凤鸣和她的丈夫，还有几十万、上百万的普通人，都成了“敌人”。这可能是后代人无法理解的：不是因为触犯了法律，不是按照法律的程序，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仅仅是因为违反了“领导”的意志（如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写了让领导不欢喜的文章，和凤鸣没有听领导的话，不肯和丈夫“划清界限”），或者干脆就是为了领导的需要，就不经任何法律手续，被宣布成了“敌人”。

在当代中国，成为敌人，就意味着你不但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而且被开除了人籍，不再是“人”了，而且真的有一个新的命名，叫做“牛鬼蛇神”。不是人，就没有了人的尊严。如和凤鸣在回忆中所说，在批斗会上，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人，包括小孩，都可以任意辱骂她。人失去了尊严，就失去了“为自己活着”的理由：这就是和凤鸣夫妇决定自杀的原因。

被宣布为“敌人”，还意味着你被社会彻底遗弃了。和凤鸣的叙述里，讲到一个细节：她在劳改农场的场部工作时，任何人都不理睬她，仿佛她这个“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被社会无视的境遇是可怕的。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当从社会关系中游离出来，为社会所不需要时，人也丧失了“活着”的理由。

这时候，还能为革命的理想活着吗？也不能了。因为革命也是一种权利，成了敌人，就不但没有革命的权利，自身也是革命的对

象了。

这样,人已经不可能“为自己活着”了,就被逼到了鲁迅说的第二个层面:“为我者活着”。

但这也是不允许的。于是,就有了和凤鸣叙述中所谈到的:强迫夫妻之间划清界限,相互揭发,特别是要求揭示私房话,也就是把革命深入、渗透到床第。如果做不到,也要最大限度地限制,以至割断夫妻之间的精神联系,最后和凤鸣夫妇连通过写信来倾诉衷情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这就是要造成连所爱者(夫妻,子女)也不需要你活着的局面,剥夺你“为我者活着”的理由,把你逼到生命的零点,许多人就是因为生命的最后一个避风港——家庭被摧毁,而走上自绝之路的。

在精神上堵塞了人的一切活路以后,还要在肉体上给以致命一击:这就是和凤鸣叙述中让人闻之色变的大饥荒。这里暂不讨论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1958年以后的大饥荒和1957年事件的联系,只要指出1957年的受害者也是大饥荒的承受者这一点就够了。

这样,无论是作为生理的人,还是心理、精神的人,都被逼到了绝境。

但,却又不让你这样一了百了地死去,要留一丝活缝:这就是和凤鸣叙述中谈到的“给出路”的政策。

什么叫“给出路”?就是改造好了,可以摘帽,从“敌人”变成“人民”。而且还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叫做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且可以“转化”。但转化有一个前提,就是要接受改造,而且要改造得好。什么叫“改造”?首先是要认罪,承认自己“不是人”,然后要放弃人的尊严,人的独立思想、意志和情感,一句话,活得不像个人,就改造好了。因此,所谓“给出路”,就是让人成为行尸走肉,看似活着,其实失去了活的意义和价值,就等于死了,或者叫做“不死不活”。

而且，“帽子”还掌握在领导手里：所谓“转化”，既然可以从敌人转化为人民，当然随时可以再从人民转化为敌人。和风鸣不就是在“文革”时又被重新转化成敌人了吗？这样，忽而“敌人”，不让你活；忽而“人民”，似乎又让你活了；忽而又是“敌人”，又不让你活了。这都使人想起了鲁迅说过的猫的性格：“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狗·猫·鼠》）我要补充的是，在当代中国的猫捉老鼠的政治游戏中，忽捉忽放，不仅是出于，或者主要不是出于“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而是出于统治的威慑作用的需要，而且不只是向和风鸣这样的已经被捉住的老鼠显示生杀予夺的权威，也是对我似的暂时还没有成为捕食对象的雀鼠示警，我虽然逃过了1957年这一劫，但在“文革”中也是在一夜之间成为敌人，以后也是被捉捉放放，时刻面临着“活下去，还是不活”的艰难选择。

但是，无论如何，和风鸣，我，还有许多人，都选择了活下去，而且也都活下来了。那么，和风鸣和我们活着的理由是什么？——这或许是更为重要，后人更感兴趣，也是和风鸣的叙述中最值得珍惜的部分。

和风鸣首先顶住了高压，坚守住了“活着”的第二层面的理由：她为“爱”（对丈夫的爱，对儿女的爱）而活着。当和风鸣讲述到她和丈夫相拥而泣的最痛苦，也最甜蜜的那一夜，我的眼睛湿润了；当她讲到在茫茫风雪中，百里寻夫的情景，我真的被震撼了；而四十年后的家祭，儿子那一声高喊，则让我热泪盈眶。我感到了人性，鲁迅说的“天性的爱”的力量：它是高居于一切权力、体制的压制之上，是最终决定一切的。

当在难友的启示下，和风鸣决定要“为生存而斗争”时，她就进入了鲁迅所说的第三个层面：“为敌人而活着”：你们不是要把我往死路

上逼吗？我偏不死，我偏要活着！这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种意义。尽管所采取的斗争手段是偷窃粮食，有道德自律的和凤鸣这样的知识分子，免不了会产生被迫的屈辱感，但这同样是出于人的求生的本能，也可以说是反抗的天性，它也自有一种神圣性。

而最引人深思的，却是当“文革”中和凤鸣重新作为敌人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时，她的房东王大爷的态度：他召集全家，郑重宣布：“大姐（这是乡亲对和凤鸣的称呼）不是‘分子’，是‘落难之人’，你们一定要善待她。”——“不是‘分子’”，就是说，当体制宣布和凤鸣是敌人时，体制的控制力稍弱的农村，底层社会的农民，父老乡亲，却不把她当做敌人。其实在此之前，和凤鸣所到的第一个农场的基层领导也称她为“犯错误的同志”。这表明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的，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王大爷视和凤鸣为“落难之人”，并要求全家善待她，更是耐人寻味。这样的观念显然来自中国文化传统，民间地方戏曲把它演义成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代代相传，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伦理。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统治的严密性达于极致的时期，也依然在民间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和凤鸣这样的体制的敌人，使他（她）们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获得了人的尊严，并成为他们活下去的一个强有力的理由。

这样，和凤鸣的叙述，让我们感受到人性（天性的爱，天性的反抗）的力量，它的永恒和不朽；也让我们体会到了民间社会老百姓日常生活伦理和逻辑的力量。它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所固有的，经过长期的渗透，已经扎根在普通民众精神结构的深处。如和凤鸣和我们这一代人的许多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在那些时刻需要面对“活下去，还是不活”的问题的严酷的日子里，它事实上成为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总体的有效性构成了无形的破坏和削减。它不显山，不露

8 活着的理由

水,甚至不易被察觉,却又是极其顽强的。而且最终的胜利者仍是这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伦理,或者说,历史总是要回到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活逻辑上来:人要活着,有尊严地活着。和凤鸣和许多她这样的“右派”,因为遵循、依靠了这样的普通人的生活逻辑,他们终于历经磨难,活了下来,并且活得有尊严,永远让后人肃然起敬。

2007年2月18日,正月初一,写于鞭炮声中

小城故事：动乱时代活着的根基

我曾撰文介绍过我的第二故乡贵州安顺的老乡戴明贤先生的《一个人的安顺》（见《读书》2004年第9期），现在我的案前又放着另一位老乡宋茨林写的《我的月光我的太阳》（贵州人民出版社）：这又是一本“一个人的安顺”，依然是用文化散文的笔调，写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小城故事，描述小城文化和人的命运。

这是安顺（以至中国）小城史上的两个“乱世”：戴明贤笔下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由于外来侵略者发动战争而带来的“战乱”，而宋茨林所写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则是在“革命”名义下发生的“内乱”。两个不同的时间坐标，既相区别又存在内在联系与连续性。

安顺有一句俗话：“小乱进城，大乱下乡。”遇到土匪骚扰这类的小乱，可以躲进城堡，寻求保护；而遭到大乱，社会、伦理秩序都面临大破坏，大崩溃，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就成了一个人的生命和精神的庇护所。从这一角度看，在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偏隅西南一角的安顺（以至整个贵州），在全国格局中，自然是一个“乡村”，因此，当中国大半河山沦陷以后，人们纷纷到这里来避难，就是必然的了：那时，连故宫里的国宝——千年文物都到安顺来寻求保护了。明贤先生可以说是以一个乡村少年的眼光来观察和表现战乱中的小城的，因此，他的记忆的中心，自然是这些外来的逃难者（“下江人”，宣传

队员,等等),还有后来的解放者(美国大兵)带来的新文化、新事物,所引起的小城人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的变化,因而写下了《下江人》、《来了美国兵》、《歌之祭》、《悲歌动地》、《影院风景》这些迷人的篇章。明贤先生还以很多篇幅写小城的日常生活,如《十指生涯》、《土话》、《玩具》、《食谱》、《岁时》,写小城的各色人等,如《郑四爷》、《江湖落拓人》、《信徒》、《“丘二”》、《女先生们》、《缙绅》,以显示“变”中的“不变”。但在安顺的内部结构中,明贤先生又是一个城市乡绅的儿子,因此,他的目光仍是集中在石头城内,而较少接触城外的乡下,仅在《五官屯看跳神》等少数篇章留下了乡村风景的剪影。因此,可以说,《一个人的安顺》写的是名副其实的“小城故事”。

正是在这里,显示了茨林的《我的月光我的太阳》的特点:他和他那一代的安顺人面临的是一场内乱,尽管也有外来者,如南下的红卫兵,他们是来散布革命种子的,来了就走了,主要的是安顺内部的流动。茨林本是城里顶尖学校的高才生,他的本来命运,应该是通过高考,进入全国一流大学,然后顺理成章地向“上”流动:至今这还是安顺城里的许多孩子的梦。但那场导致内乱的革命却堵住了茨林这样的安顺孩子向上流动的路,原因是他们的父母辈和四十年代的旧社会、旧安顺有过这样那样的联系,就有了“原罪”,子女也就有了出身罪,就只有向下流动的唯一出路。于是,城里的高才生成了“新农民”,不过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把他们叫做“知识青年”,简称“知青”。他们是被城市抛出来的,农村却接纳了他们;事后来看,他们实际上是到乡村社会来避难了:这正是“大难下乡”。这样,他们就和四十年代的“下江人”有了相似的境遇,说不定那些乡村少年(他们中的有些人成了茨林的学生),也像当年的明贤先生一样,以好奇、羡慕的眼光看这些城里人所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并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但茨林们毕竟不同于四十年代的“下江人”:他们不仅有着后者所没有的戴罪之身,而且“下江人”自有家乡,因此他们可以身在

异乡而不断高唱：“我的家在江南”，但茨林们却要重新寻找自己的“家”，生存的和精神的家园。

这也是事后才意识到的，当他们被迫来到农村落户，却无意中闯入、走进了“文化安顺”的根底。茨林所去的苏吕堡正是又过四十年的今天被广泛关注的“屯堡”，那里存留着丰厚的“屯堡文化”。当茨林“邂逅放鸭人”，度过了让他感受“民间的深厚和山野的神奇”的难忘一夜；当他每天早上站在村口的平台上，“远远地看见毛妹从田坝里来了，像挑着两座小山”（《毛妹大哥与毛妹大嫂》），他实际上已于无意中领悟了刘纲纪所概括的安顺本土文化的三大基因：“奇诡”、“刚健”和“质朴”了。刘纲纪先生还分析说：“屯堡文化是安顺本土文化与外来的江南文化相互交融的产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江南“重视风雅的精神”的影响，被人们视为“荒蛮之地”的安顺农村，仍有“重视文化的优良传统”，就不是偶然的了（《安顺文化沉思录》）。所以，后来“身材瘦小像只猴子”，却有大眼光的苏吕堡大队支书，力主恢复村办小学，并且力留茨林担任教师，这背后显然有传统的影响和作用，茨林也因此获得了栖身之地和精神庇护。

更耐人寻味的是，后来茨林由城边的苏吕堡，到偏远的胡家湾，最后到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洼里的麻风村，也就是一步一步地往下走，往深处走，一方面，这是生计的日见艰辛，另一面却是和安顺文化的深部接触。

当他走进“双凤山寺”，“玉皇阁遗址”，朝夕面对具有“参天气势”，又附着着“怪树成精”传说的五棵白果树，并亲身体会了“白衣女人神出鬼没”的恐怖以后，他就领悟了安顺文化固有的神秘性（《庙与学校》）。当他来到麻风村的“生命之河”：“夕阳映在河里，大红，软乎乎地浸在绿色的水里，显得异样的大，我第一次看见水里的太阳竟是这般的怪异”——刘纲纪先生的文章曾谈到《易经》有“天在山中”、“水在火上”之象，认为这都是“奇诡的想象”（《安顺文化沉

思录》);现在茨林所看见的“日在水中”之象,大概就最能体现安顺文化的“奇诡”之美了。还有那“山月惊马”：“跟着枣红马摸黑前进,很快就进入石林。马蹄踢踏石板,在石林发出脆响,有如深涧滴水,虽说响如水滴,但铁蹄在石板路上击出火星,使我疑心这是匹神马。走出石林,忽觉眼前一亮,削壁后面猛地出现一个怪东西,又大又圆又红又亮——这是月亮,惊得枣红马差一点又掀翻驮子。”这样的奇景、奇境,是城里的高才生所绝对想象不到的,却是安顺山川、人文奇诡美的精魂之所结,现在,茨林领悟了。

他也就在这奇诡的大自然里,发现了人的野性,看看这些驮马队员：“个个剽悍,令人生畏”,只要一出现在场坝上,“总是威风八面,出尽风头”,而这位“方脸,浓眉,大眼”的布依族队员更是身怀“马上打飞石”的绝技,拳头大小的石头纷纷掷出,呼呼有声,在岩石上击出火星,连发脆响:在这些神勇的“猛男”的身上,保留着的“侠士之风”,其实是内蕴着纲纪先生所说的安顺文化中的刚健之气的(《美丽的“鬼魅世界”》),但在安顺城里却由于种种原因,被淡化,以至消解了,现在,茨林被发配到山野,却意外地与之相逢了:这是幸,还是不幸?

而真正对茨林形成精神支撑的,却是依然留存于乡村底层,特别是村寨老人中的文化崇拜。听听这掷地有声的说话:“读书人是孔孟子弟,顶天立地的,怕哪样?砚台可以打鬼,毛笔可以杀鬼!天无忌,地无忌,秀才无忌!”说“掷地有声”,是因为此时的中国,正在革文化的命,“秀才”正面临灭顶之灾。山里的村民们或许并不知道这些,因此,这当然不是有意的反抗,而完全是已经渗入意识深处的前述安顺重视文化的传统在起作用。学者们把这样的传统称为“小传统”,即不同于以文化典籍形态存在的“大传统”,而是以一种民间的价值观念、思维与行动逻辑存在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它具有某种超稳定性,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大动荡、大改组也未能将其根